

运动战和歼灭战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莱芜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文敬读

□ 魏冠明

莱芜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是为了纪念莱芜战役中牺牲的英烈修建的。塔高19.8米，方形塔底边长为8.15米，由泰山花岗石砌成，象征着在莱芜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重如泰山。塔碑阳面七个鎏金大字“革命烈士纪念碑”为毛泽东的手迹，阴面为鎏金隶书碑文，全文如下：

莱芜战役，是华东人民解放军在莱芜地区所进行的运动战。一九四七年一月底，国民党军队分南北两线进攻我山东解放区，南线国民党军队以八个整编师，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北线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三个军由明水、淄川、博山等地南下莱芜、新泰策应，企图同华东人民解放军主力在沂蒙山区决战。我军在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以一部狙击南线之敌，主力则北上莱芜歼击李仙洲集团。战斗自二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三日午结束，全歼该敌第二绥靖区前方指挥部、第四十六军军部、第七十三军军部和七个整旅，共六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收复城市十三座。莱芜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

碑文记述了莱芜战役的背景、经过和辉煌战果，文字简洁、叙事清晰。敬读碑文，仿佛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让人对先烈们的无限敬意油然而生。

(一)

1947年1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企图以南北夹击的态势占领山东解放区，并逼迫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临沂地区与其进行战略决战。国民党在南线出动了7个整编师和第7军共20个旅的兵力，分三路北犯临沂，北线则由驻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经明水、淄川、博山一线南下，攻击我后方莱芜、新

泰地区。2月4日毛泽东电报指示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这种不计较一城一池得失的作战原则，使华东野战军能够不受束缚，根据战场形势灵活地应对来犯之敌。通过细致缜密地分析敌情，华东野战军决定主动撤离临沂，以小部分兵力阻击南线之敌，主力转兵北上，于新泰、莱芜地区围歼李仙洲所率的北线之敌。

(二)

华东野战军主力昼伏夜行，于2月19日逼近莱芜两侧，完成了战役合围。20日13时，战斗打响，八纵主力和九纵一部在和庄设伏，全歼由博山南下的第77师，击毙师长田君健。20日晚，一纵分别向莱芜城西和城北的国民党军外围阵地发起攻击。21日，我军占领了城北的马家村和小洼村两个阵地。李仙洲强令韩浚指挥第73军夺回小洼村阵地，确保莱芜北面公路畅通，以留后路。解放军以一个连的兵力坚守小洼村5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0倍以上兵力的轮番进攻。黄昏时分，国民党军攻击不利，退入城内。22日，敌人又对城西的制高点安乐山阵地发动进攻，一纵1师的8连充分发扬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敌人出动飞机大炮轮番轰炸的情况下，以全连多数伤亡的代价击溃了敌人的7次冲锋，把国民党大军又拖住了一天。

双方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吐丝口镇。吐丝口镇又称口镇，位于莱芜城北以十多公里处，是由胶济线进入鲁中的咽喉要道，这里囤积了国民党军队上百吨炸药和数十万斤粮食，是驻莱芜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补给基地，因此这里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20日晚，六纵对吐丝口镇展开攻击，敌人利用优势火力疯狂扫射，双方反复拉锯并进行了巷战，战至22日上午，解放军占领了吐丝口镇大部分街道房屋，仅有东北角因道路狭窄，解放军兵力无法展开，敌师部据此负隅顽抗，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23日早晨，李仙洲开始撤退。等到敌军全部撤离莱芜城，四纵一个师迅速占领了莱芜城，截断了敌军的退路，而后埋伏在公路两侧的解放军发起了围歼敌军的总攻。在我军严密的包围圈中，敌军做困兽犹斗，在空军的掩护下妄图杀开一条血路与吐丝口镇守军汇合。我军广大指战员奋勇作战，冲上去与敌人进行肉搏，击溃敌军。到下午5时战斗结束，全歼第二绥靖区前方指挥部、第46军军部、第73军军部和7个整旅，共6万余人。随后我军乘胜追击，顺势解放了博山、周村等13座县城，取得了华东解放战争中一次空前的胜利。

(三)

莱芜战役歼敌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均创造了内战爆发以来我军的纪录。此役不但打破了敌人南北夹击的计划，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而且把渤海、鲁中、胶东几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极大鼓舞了广大解放区军民的士气，进一步坚定了我方必胜的信心，同时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

正如碑文所指出：“莱芜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和国民党军气势汹汹的进攻，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军委制定了“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针。莱芜战役中，我军在南线主动撤出临沂，快速把主力转移到北线，此举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使敌人南线的主力部队失去了用武之地。我军集中优势兵力，以临沂一座空城的代价取得了歼敌6万多人



煌战果。此战成为我军历史上运动战和歼灭战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莱芜战役的胜利是在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取得的。鲁中人民响应我军号召，提出了“毁家支前”的口号，支援服务前线的民工达60万人，为我军几十万的作战人员供应粮草、运送武器装备弹药和伤病员，及时抢修道路。大批地方武装力量、民兵团与主力部队密切配合，他们坚壁清野、袭击敌军运输队、侦察敌情、破坏公路，给敌军制造了极大的困难，充分展示了人民战争的鲜明特色。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袁金辉

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应该继续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这些红色资源，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神。

六是充分利用好红色文化作品春风化雨，让人民群众在文化感受中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本次党史学习教育在借鉴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好做法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的特点和党员干部实际需求，在学习方法和载体上进行了大胆创新，特别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出了一系列可视化、数字化的党史题材红色文化作品，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教育效果。比如电影党课、音乐党课、美术党课、戏曲党课等特色艺术党课，在润物无声中让党的故事、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应该更加注重运用现代科技和传播途径，打造更多党史题材的红色文化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通过互联网开展全方位、多维度传播，让人民群众在接受文化艺术熏陶中学习党的历史、增强党性修养、激发爱国热情。

我们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习永远在路上。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做到常学常新、常学常悟、常学常得。

华侨对抗战胜利的突出贡献

□ 刘芳彬

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华侨毁家纾难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以各种方式融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中华民族爱国史册。

开展救亡宣传，从政治舆论上声援祖国抗战。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社团立即进行抗日阵容的重新组合，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广大华侨不分地域、党派、帮派空前团结起来，成立抗日组织援助祖国抗战。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先后涌现出3940多个华侨抗日团体。这些团体成立后不断发表宣言和通电，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地华侨社团表示“誓死力争，以为政府后盾”，呼吁国内“齐一战线，共赴国难”“携手抗战”。同时，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分裂、反对内战，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侨社团积极动员组织广大华侨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开展争取国际声援活动。法国巴黎召开各团体援华抗日代表大会，欧洲华侨组织代表团向九国公约会议请愿，要求制裁侵略者。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通过发动业界华侨把印有各种文字的宣传品夹在洗好的衣服中，散发抗日传单和小册子达10万份以上。美国医药援华会和旅美华侨团体发起的“一碗饭运动”，得到广泛响应。此外，抗日救国组织在亚、非、美、欧各大洲的广大侨居地区，通过举行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等方式，争取当地各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在抗日社团和爱国侨领组织动员和影响下，华侨创办的抗日报刊达150多家，在争取国际援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捐资助饷，从经济上提供祖国抗战的物质保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和物资方面的困难。海外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从经济上支援了祖国抗战。抗战期间，华侨捐款总计逾13亿元国币，侨汇达95亿元以上。海外侨胞还积极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各类救国公债11亿余元国币，超过战时发行公债总额的1/3，这些公债战后并没偿还，实际上无异于捐款。

海外华侨筹措战费的名目和方式灵活多样，诸如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义演义卖捐、献金等，不一而足。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曾生动形象地描绘道：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在抗日救国的崇高精神激励下，海外侨胞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贫富，均慷慨解囊。为筹捐款国倾家荡产者有之、“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者有之，甚至还有鬻子助赈者，感天动地，书写了抗战史上侨胞救国之可歌可泣的一页。对于国内紧缺的战需物资，海外华侨也予以大力捐助，仅大宗物资即有飞机数百架、坦克汽车上千辆及无数衣物、布匹、器材药品等。另外，还有不少华侨移资国内尤其是西南大后方的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创办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从而增强了祖国的经济实力。

中国共产党很重视海外华侨工作，在延安成立了以朱德为主任的海外工作委员会，潘汉年、廖承志则在香港具体筹划侨务工作，许多党员干部被派往海外华侨中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海外侨胞的捐款捐物和慰问函电不断飞往延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人员手中。旅美华侨李兆焕捐资兴办了延安“洛杉机托儿所”，并向抗日军政大学捐助经费；泰国归侨陈子谷将自己所得遗产20万元和募集的6万元全部捐给新四军；荷印侨领阮家金带头捐献钱物并径送延安；还有侨胞通过“香港八办”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给予经济支援；等等。

侨胞的拥戴和支持坚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斗志和必胜信心。

回国从戎，在军事力量上支持祖国抗战。抗战期间，大批华侨青年历尽千难万险，回国参军参战，或到后方为战争服务。华侨义勇工程队、救护队、战时服务团、战地记者团等华侨组织遍布抗战前线。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统计，仅从东南亚、美洲和澳洲等地回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人左右。回国参战的华侨，大多经过严格甄选、短期培训，其中不乏身怀特种技术、国内紧缺的专门人才，他们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独特作用。

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力量薄弱，飞行员、机械师等专业人才奇缺。海外侨胞积极响应“航空救国”号召，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航校大批华裔飞行员回国参战，华侨成为中国空军的作战主力。为实现抗战报国的梦想，许多华侨青年参加飞虎队，在与日军艰难争夺制空权中，舍生忘死。有名震中外的“中国战鹰”陈瑞珪，有被誉为“空军英雄”虎将的黄泮扬，有血洒长空的黄新瑞，还有在驼峰航线执行38次飞行任务，获得4枚勋章的黎荣福，以及其他数十位英烈。他们为保卫中国南方地区和支持东南亚国家抗战做出不朽功勋。

1939年，我国沿海口岸和对外的主要交通要道全部沦陷，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了运输援华物资主通道。当时，国内的汽车司机及汽车维修技工十分短缺。侨领陈嘉庚招募组织39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效力，占滇缅公路机工一半以上。他们克服路险、雨滑、疟疾乃至敌机轰炸等种种艰难险阻，将45.2万吨战略物资运送前线，1800多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也出现一批优秀的归侨将士。菲律宾归侨叶飞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员；澳大利亚归侨曾生任东江纵队司令员；泰国归侨钟若潮任东江纵队独立中队政委；印尼归侨李林在晋绥边区领导抗日游击队英勇奋战，被赞为“民族女英雄”；等等。海外中华好儿女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有力支援了祖国抗战。